



制度是一种约束还是一种资源

——比较制度优势的来源及影响研究

汪涛 赵鹏 金珞欣

摘要:在以往关于国际化的研究中,制度环境常常会被认为是能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为了进一步解释企业如何有效地解决因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带来的不适,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部分学者基于“制度距离”这一视角支持企业会受到外部环境限制这一观点,比较资本主义学派则将制度多样化视为企业拥有的一项资源,认为企业可以依据不同的制度环境特征来获得支持不同经济活动的比较制度优势。本文在梳理国外文献的基础上,从比较制度优势的概念、来源以及影响这三方面进行总结评述,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未来研究方向。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笔者认为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时不能只考虑如何去适应东道国的制度环境,还应该合理利用不同制度之间存在的互补性来获得竞争优势。

关键词:比较资本主义;比较制度优势;制度质量;制度互补性

中图分类号:F0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17)03-0144-10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以及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所面临各种压力的增加,跨国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由于企业是在一定环境下进行国际化运作的,其决策往往受限于一系列外在的环境压力(Forstenlechner & Mellahi, 2011: 455-461),东道国环境对企业而言十分重要(Pradelski et al., 2012: 882-897)。跨国企业在东道国,不仅要面对不同国家任务环境的差异(譬如不同的资源来源、竞争者、交易伙伴、市场和消费者特征),同时也要面临各个国家制度环境的差异(譬如不同的法律法规、社会规范和文化传统)。因此,从外部环境的视角,探讨企业如何针对东道国环境制定战略,以找到适应制度和差异方法的研究十分重要。

在以往关于国际商务的研究中,部分学者主要是通过围绕“制度距离”来探讨企业如何应对自身的发展受外部环境因素所限制的问题。所谓制度距离(Institutional Distance),是指任意两个国家之间在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层面上存在相似性或差异性(Singh & Gaur, 2012: 328-341)。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或差异对跨国企业的进入方式选择、国家差异化战略以及业绩都发挥着重要作用(Griffith & Dimitrova, 2014: 50-67)。制度差异提升了进入成本,降低了运营效率,限制了企业转移核心能力或母国实践经验的能力(Contractor, Lahiri & Elango, 2014: 931-941)。因此立足于制度距离基础上进行分析,实际上是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或差异视为能对跨国公司发展起到约束作用的不利因素,从而研究跨国公司如何在战略上处理制度差异问题,达到适应东道国制度环境的目的。除此之外,以上观点将制度看作是由具有外生性的政治或文化力量所决定的(Contractor, Lahiri & Elango, 2014: 931-941),并且认为企业只有适应在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环境才能获得更高的绩效。

然而,受关注度较低的“比较资本主义学派”关于跨国公司所面临制度环境的研究结论与上述观点却有所不同。该学派的研究重点在于强调制度是企业的一种战略资源,并认为制度多样化可以被视为是企业所拥有的一项资源,是能够支持不同经济活动的比较制度优势(Jackson & Deeg,2008:540-561)。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善于利用这种资源,就能够制度化地为塑造不同种类的战略和协作模式提供能力。不同的制度体系将通过几个相互联系的职能领域,如财务,公司治理,劳资关系,技能形成,创新等来塑造企业的能力。比较资本主义认为,战略受制度结构的限制,并且因此导致了在不同制度体系下差异化的公司行为,即制度结构给企业提供采取不同经营模式的差异化优势(Jackson & Deeg,2008; Hall & Soskice,2003)。

但是,由于以往关于比较制度优势的研究在背景与理论视角上存在差异,因此学术界至今仍未有统一的结论。本文从比较制度优势的概念、来源以及可能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几个方面对关于比较制度优势研究的演进脉络进行了梳理,并在分析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希望能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来建立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进而清晰地呈现比较制度优势的研究发展进程,更深层次地挖掘比较制度优势给企业国际化所带来的影响。

一、制度理论和比较制度优势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 制度理论

制度理论主要研究经济、社会、政治等各类型的外在环境压力对企业结构和行为的影响(Kirca et al., 2011:683-699)。关于对制度定义的界定, North(1990)认为制度可以分为包括政治、经济规则以及契约等在内的正式制度以及由社会准则、行为规范以及行业惯例等组成的非正式制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制度可以看作是是一套涉及某个国家的政治、法律法规、社会规范以及文化认知等各方面的博弈体系,它是被人为制定的限制并且代表着一个社会中的游戏规则。而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指的是与某一社会或区域相联系的文化涵义、理性和社会规范。企业若想要获得包括消费者、专业人士、公众意见和规制者等在内的关键涉众(constituencies)的接受和支持,就必须要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获得相应的合法性(legitimacy)(陈嘉文、姚小涛,2015;陈宏辉等,2016)。总体上来说,制度理论将企业看作是嵌入在社会制度环境中的个体,而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经营活动的外在因素,该理论主要强调的是制度环境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具体的影响机制主要是制度环境能通过影响企业经营活动的行动基础,进而影响市场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接受程度。因此,是否可以在制度环境中通过取得合法性而赢得竞争优势必然是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之一。

(二) 比较制度优势理论

Hall 和 Soskice(2003)分析了制度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所起到的经济职能,并且提出比较制度优势理论,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制度结构能给企业提供发起特定具体行为的优势。所谓比较制度优势(Institu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是指当某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和制度结构优于另一国家时,使得该国家在生产效率、市场效益等方面具备相对优势。随后, Hall 和 Thelen(2009)指出,若某国的制度能为在特定地理位置上的生产运作或产业的形成带来优势,则该国具有比较制度优势。另外,比较制度优势还可以被理解为是使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拥有比较优势的制度基础(Jackson & Deeg,2008:540-561)。众所周知,制度是以不同的国家结构或类型的形式存在的。在这样的前提下,由于不同的国家会给予企业经济行为不同的制度支持,因此比较制度优势有利于形成特定优势产业和国家竞争优势。这一观点主要是建立在国际贸易的资源禀赋差异论的基础上,将一国制度看作是本国企业具有的特定资源,认为制度基础影响了一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并使得该国企业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即倾向于开发最能有效利用其比较制度优势的市场(Hall & Gingerich,2009:449-482)。

二、制度理论和比较制度优势理论的区别

比较制度优势理论实际上是制度理论的一个分支,两者存在的差异主要是由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不

同引起的。首先,比较制度优势理论所涉及的制度领域包括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即当企业进入另一个国家(新进产业)时,不仅面临着东道国(新进产业)的经营环境差异,也面临着东道国(新进产业)大部分企业经营制度的差异。具体来讲,这些制度领域可以是一国企业或者一个特定产业的企业所处的外部经营制度环境,比如财政系统、公司间关系及福利等国家层面的制度领域,也包括在此国家,或者特定产业内,大部分企业自身的制度特征,比如公司治理、劳资关系、技能培育、工作组织以及创新体制等企业层面的制度领域。与比较制度优势理论不同的是,在制度理论中所提出的制度距离仅就国家层面的企业经营所处的制度环境差异进行了分析;其次,比较制度优势的存在主要是因为各个制度领域之间能达成相互协调的状态,并且该理论认为当一方制度的运行效率取决于并且影响着另外制度领域的运行时便会形成制度互补性(汪涛等,2015:42-47)。而制度理论侧重于研究母国和东道主国家之间存在的制度距离以及企业应该如何主动地有效解决制度距离带来的制度压力,以期最终实现取得合法性的目的(Yang & Su,2014:721-725)。综上所述,结合制度理论和比较制度优势理论可以发现,当跨国企业不仅带有在母国所形成的企业制度层面的优势,同时面临东道国企业在其发展环境下所形成的与之相反的差异化优势时,那么,在国家之间存在的制度距离既定的情况下,由于各个国家内部不同经济领域间所形成的比较制度优势不同,也可能导致跨国企业经济行为收效的差异。

三、比较制度优势的来源

比较资本主义理论认为,制度多元化(制度多样性)是比较制度优势形成的基础与前提条件。Hall和Sokkice(2001)提出,比较资本主义模型中最核心的论点是制度领域间具有互补性,他们强调了制度结构与制度互补性的重要作用(Hall & Gingerich,2009:449-482)。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系统中,具有多元化的制度安排,并且制度之间的差异能影响国家和地区给产业生产率以及国际竞争力方面所带来的优势以及劣势(汪涛等,2015:42-47)。通过对比较资本主义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比较制度优势主要来源于制度质量以及制度互补性。

(一) 制度质量

1. 制度质量的概念

制度是一个国家经济表现、经济发展的基本决定因素,它影响增长率,决定收入水平,是促进和吸引FDI的关键因素,并因此备受关注(Acemoglu,2002:1231-1294)。制度质量,意味着合同强制力、产权、股东保护等的质量,好的制度会惩罚不守规则的一方,并且推动更能促进成功的行为(Hall & Gingerich,2009:449-482)。

2. 制度质量决定比较制度优势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制度的差异很可能成为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来源,尤其是制度质量的差异(Jackson & Deeg,2008:540-561)。一些学者认为制度质量是贸易的决定因素,尤其是比较优势的来源(North,1990; Hall & Daniel,2009)。商品的生产,尤其是复杂商品的生产需要很多合同来保证,因此就更需要其所在国家的合同执行力。这就意味着好的合同执行力,也就是较高水平的制度质量,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商品生产比较优势的来源(Nunn,2007:569-600)。对于具有较高制度质量的经济(定义为财政部门的竞争力,公司治理的质量以及产权的保护水平),均衡产出和价格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财政是被动的,并非比较优势的来源。对于具有较低制度质量的经济,财政系统的质量是独立的比较优势的来源。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定义为“合同强制力、产权、股东保护等”的制度质量,但可看出,距离较近Ju和Wei(2011)的文章已经开始研究具体经济领域的制度质量,虽然未明确提出比较资本主义的相关概念,但其研究所涉及的财政系统以及公司治理等都是比较资本主义重点研究的制度领域。也就是说,目前的研究已证实,制度质量是比较制度优势的影响因素之一,虽然二者对制度的定义、内涵的表述,以及研究领域并不完全相同,但Ju和Wei(2011)已经开始统一两者的定义,明确其范畴,以便将制度质量更多地运用于比较制度优势的相关研究之中。

3. 制度质量的衡量

由于制度是不可观测的，所以学者一般都用制度的代理变量来衡量正式制度质量的高低。本文根据罗小芳和卢现祥(2011)、Kaufmann, Kraay 和 Mastruzzi(2007)、Chong 和 Calderón(2000)以及 Olson(1996)所提到的关于制度质量的测量指标进行了归纳整理，主要内容如表 1 所示。

表 1 制度质量指标

制度指标	考夫曼(Kaufmann)指标	衡量各国政府治理水平
正式制度指标	经济自由度指数	衡量各国经济自由度状况,是目前运用非常广泛的综合衡量一国正式制度质量的指标
	合约密集型货币比率	衡量各国或地区有效保护产权和合约的水平
	企业经营环境指数	衡量国家和地区的商业环境
	全球腐败指数	衡量各国腐败的程度
	法治指数	衡量各国的法治水平
	国际国家风险指数	评估各国的政治、经济和金融风险
	盖斯泰尔指数	衡量各国的政治自由度(包括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
非正式制度指标	信任指数	衡量社会的信任程度

(二) 制度的互补性

1. 制度互补性的概念

社会经济问题不可能通过单一的政策措施来解决,需要在不同的政策网络中进行协调,这正是由于制度互补性的存在。制度互补性这一概念也应用于诸多制度领域与不同制度层面:从宏观经济(Hall & Thelen, 2009: 449-482)到公司治理和公司绩效(Levchenko, 2004; 汪涛等, 2015);从产业关系(Kirca & Bearden, 2011: 683-699)到法律制度(Siems & Deakin, 2010: 120-140)和政府政策(Hall & Soskice, 2003: 50-51)。从过往文献上看,虽然制度互补性这一思想广泛运用于多个研究领域,并且概念间的关联性也得到充分的阐述,对制度互补性这一概念的确切定义仍未达成一致,主流观点如表 2 所示。

表 2 制度互补性的概念

作者	概念
Boyer, 2005	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制度结合运行时会带来绩效的帕累托改进
Aoki, 2001	某一特定制度的效果因同一制度领域或相关领域其他制度的存在而增强
Hall & Soskice, 2001	一方制度的效率(或存在)提升了另一方制度的绩效(或效率)
Amble, 2003	一个领域某一特定制度形式的存在,可以增强、巩固另一领域其他制度的存在、运行和效率
Amable, Ernst & Palombarini, 2005	对绩效的测量;系统的动态稳定性

诸多概念和定义虽然具体表述不同,但所表达的都是特定制度领域相互影响的作用效果。可以认为,某一特定制度领域的绩效,由于其他相关制度领域的存在而增强时,即可称为制度间存在互补性。这种属于广义的制度互补性的定义,而狭义的定义则为:不同制度领域间的相互作用必须对经济运行的整体效果产生促进作用,比如 GDP 的增长、失业率等宏观经济指标。在做一般性的讨论时,学者们更多采取的是广义的定义,即不考虑宏观经济指标。

2. 研究层面与具体范畴

以往的研究基本是关注某一国内的不同制度领域间的制度互补性。目前,比较资本主义理论所涉及的国家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制度领域包含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国家层面指的是一国企业的经营行为所处的制度环境,具体为:财政系统、公司间关系和社会福利状态;企业层面指的是一国内绝大部分企业的企业制度的特点,具体包括:公司治理、劳资关系、技能培育、工作组织以及创新体制等。本文梳理了 North(1990)、Kaufmann, Kraay 和 Mastruzzi(2007)、Scott(2006)对制度层面的介绍,如表 3 所示。

表3 国家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制度领域

国家层面	制度领域	概念	分类	影响领域
国家层面	财政系统	家庭收入通过财政系统渠道而对生产部门进行投资	基于市场/基于银行	投资模式;公司治理
	公司间关系	企业间合作与竞争的程度	交易关系/责任关系	合作与竞争;公司治理;创新
	福利体制	国家或政府在立法或政策范围内为所有对象普遍提供在一定的生活水平上的资金和服务的社会保障制度	自由/保守/社会民主	劳动力市场参与;储蓄与投资方式;工会组织
企业层面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据以对工商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公司治理结构明确规定了公司的各个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利分布,诸如董事会、经理层、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内部/外部或者小股东/大股东	公司战略;收入分配;技能;投资;创新
	劳资关系	雇主、工会和员工的职能,以及对雇佣成本的控制状态	调控、集中/非调控、分散	内部与外部的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工资水平;失业
	技能培育	对员工技能的培养和创造	国家/协会/市场/企业	收入分配;工作组织;创新;劳资关系;公司战略
	工作组织	企业内分工、生产模式	福特式/弹性专业化/多元化优质生产	商业战略;劳资关系
	创新模式	特定国家(产业)的企业的创新模式的特点、类型	突破式/渐进式	工作组织;商业战略;就业

制度是系统性的、相互依赖的结构,而非单独存在的(North,1990;Amable,2003)。也就是说企业在以上所提及的制度领域间进行协调的方式是相互影响的,从而会在不同的制度领域间建立互补的战略(Milgrom & Roberts,1990:511-528)。进而,不同领域制度间的内部凝聚力就在国家层面建立了非随机的制度类型或模式,并且在企业层面建立特殊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战略。不同国家(产业)内部的不同制度领域间通过相互作用,形成了制度互补性,也就是制度间的相互增强,从而对特定的企业经济行为产生有利的影响,即有利于特定的经济行为的展开。已有研究对制度互补性的阐述主要围绕国家和企业层面分为三种模式:国家和企业层面的制度领域间的互补性,国家层面的制度领域间的互补性以及企业层面的制度领域间的互补性。

3. 制度互补性的内涵

以上关于制度互补性概念的诸多定义表明,学者会根据研究情境的需要而对其定义进行阐述。Höpner等(2006)提出了制度互补性的两层涵义:第一层的互补性就是指相似;第二层的互补性指一个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能相互取长补短,即使是彼此方向相反的组成部分(所对应的现象并不多但却值得挖掘)。第一种释义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认为比较制度优势的形成是呈倒U型的趋势,即不同制度领域间相同的制度方向可产生互补性,进而产生比较制度优势,但也有少量研究认为是“杂交”的制度比较具有优势(Höpner et al.,2006:142-155)。今后学术界在企业国际化的研究议题上,应进一步挖掘第二种释义。

四、比较制度优势的影响

正如前文所述,相对于制度距离理论将制度多样性视为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差异从而对跨国经营产生限制,而比较资本主义学派通过发展比较制度优势理论,认为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不同的经济行为有促进或抑制的作用,其审视了制度是如何塑造企业所能获得的资源(inputs)支持。以往文献多关注母国对自己国家的企业发展所提供的一种促进效果,提供了来自不同制度维度的比较优势,即企业根据不同制度环境来安排差异化的企业经营活动,比如在市场自由度高的制度环境中安排创新程度高的产品,而在协调型市场中安排标准化生产。再比如,基于渐进式创新、扁平化组织的日本和基于

突破式创新、网络式组织的美国之间不同的比较优势，跨国公司通过利用不同制度之间的互补性达到效率最优。正是如此，可以解释为何制度距离小的国家间，或是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间也会形成竞争优势的差异。

（一）对制度改变的影响

1. 制度改变的路径依赖特性

从国家层面上来看，当特定国家（产业）由于制度而形成自身的比较优势，即如果某个国家制度领域呈现出与另一个国家制度相契合的互补性，这将对双方制度改变的动态性特征产生影响。由于已形成的比较制度优势，制度改变很可能是渐进的、路径依赖的（Hall & Thelen, 2009: 449-482）。由于制度互补性，制度间会产生递增的回报，并且会导致特定行为模式的相互增强。因此，单一制度的引进收效甚微、效率不理想的原因在于缺乏制度领域的互补支持（Olson, 1996: 3-24）。同理，从企业层面上来看，来自不同国家的跨国企业都面临着外部挑战，其要根据自身所处的制度环境带来的限制来适应不同的发展方式，这会导致跨国企业与东道主国家之间也存在制度互补性，从而也会影响双方制度改变的动态性。因此，虽然制度会改变，调整将会是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不可能将整个制度结构从一种资本主义类型转化为另一种类型（Hall & Soskice, 2003; 汪涛等, 2015）。这就提升了某个国家或者企业制度改变的难度，也解释了为何新制度的引进往往收效欠佳，甚至可能导致意料之外的结果（Griffith & Dimitrova, 2014: 328-341）。

2. 制度改变的彻底性特征

对于制度互补性对制度改变的影响，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一项制度或措施的建立，其所带来的改变将会对周围的制度产生混合的效应。因为组成社会系统的各个制度领域（包括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间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并且一个制度领域的改变会引发别的制度领域的改变（Crouch & Eds, 1999; Ju & Wei, 2011）。即便是渐进的改变更也会慢慢侵蚀别的制度领域，从而导致相关制度领域日益发生改变（Ju & Wei, 2011: 178-187）。因为一旦单独改变其中一个要素（包括引入新的其他制度）而不考虑其他互补制度，将会打破原先的均衡，破坏原有互补性的关系。其结果可能导致引入的新制度（或改革的旧制度）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会损害整个制度体系的效率。因此，在进行制度变迁时，必须要考虑互补性的影响，避免引入与其他制度不相适应的制度而导致互补关系被破坏。

如上文所述，鉴于比较制度优势对制度改变产生的影响，企业在考虑国际化问题时需要考虑制度互补性这一因素。也就是说，当企业在进入东道国时，应充分考虑制度互补性的影响。因此，从企业层面上来看，倘若企业只是一味地改变自身的制度而去适应东道国的经营环境，很可能破坏原有的优势，甚至使得自身无法真正融入当地的制度环境中，最终将会给企业造成无法预估的损失。而从国家层面上来看，倘若某个国家制度领域发生了改变，将会使得新引进的制度因为与别的制度领域缺乏制度互补性而不能发挥其作用，所以也会影响国家制度领域改变的彻底性。

（二）对国家优势产业的影响

比较制度优势即是国家（产业）比较优势形成的制度基础，因此比较制度优势可促使国家竞争优势、国家优势产业的形成。比如，在美国、英国、加拿大之类的自由经济体制下，市场在协调经济行为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自由市场经济通过四个关键领域而共享以下特点：短期导向的公司财政；非限制的劳动力市场；一般教育和公司间强烈的竞争；当国家系统提供了一种有利于进行突破式创新模式的比较制度优势，此类国家在电子、软件等产业容易建立产业优势。再比如在德国、瑞典和澳大利亚之类协调型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些国家运用了长期的产业财政、可协调的产业关系、高水平的产业和企业具体的培训、技术中的合作和跨公司的标准制定，这给公司提供了追求产量和市场战略的动机和能力，为企业的渐进式创新提供了比较制度优势，所以这类国家在机械、制造等产业容易建立产业优势。

五、现有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笔者主要通过对比较制度优势的概念、来源与影响这三方面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回顾。从目前来看，

该领域虽然不乏研究成果,但依然存在一些值得被重视和深入探讨的地方。

首先,比较制度优势概念界定和测量方法比较模糊。Hall和Soskice(2003)指出,比较制度优势为一国的制度质量和制度结构优于另一国家,从而在生产效率、市场效益等方面所具备的相对优势。通过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尽管大多数学者认同Acemoglu(2002)所提出的观点,比较制度优势可以理解为形成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的制度基础。但是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依然存在许多界定模糊之处,并且对其维度并未充分说明,未构建成熟的构念或变量,无法对其进行测量。未来的研究应根据具体需要,明晰不同制度间比较的内容与维度,明确界定比较制度优势的概念与测量方法,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科学的测量指标。

第二,制度互补性是因为“制度一致性”还是“制度杂交”,这个问题还有待解决。经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比较制度优势主要来源于制度质量与制度互补性。制度质量是相对成熟的研究构念,已有多种指标可以对其进行衡量。而关于制度互补性的研究相对而言较少,并且目前也只局限于对一国内不同制度领域间互补性的讨论。但是当研究背景扩展到企业国际化时,对制度互补性的定义和内涵也变得更为复杂起来,特别是关于制度互补性存在“相似即为互补”以及“制度杂交”这两者矛盾的解释方法。从目前来看,在以往的研究中对第二种涵义诠释得较少,但当涉及企业国际化时,由于制度距离的存在,“制度杂交”相对于“制度一致性”是更适于描述企业国际化所面临的制度现状。因此,弄清楚“制度杂交”是否能给跨国企业带来优势,以及“制度杂交”和“制度一致性”两者各自给跨国企业经营绩效所带来的影响,这对于跨国企业在东道主国家的战略调整具有毋庸置疑的意义。

第三,制度不分优劣,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就一定会存在比较制度优势吗?根据本文所论述的制度质量和制度互补性这两方面的比较制度优势的来源,可推断发达国家的制度一般优于发展中国家,即其更具比较制度优势。具体来讲,就制度质量而言,发达国家优于发展中国家;同时,由于发达国家的制度发展相对稳定,各领域间的相互磨合程度较高,从而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具制度互补性。但根据目前各国经济发展现状,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逐渐认同了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模式,制度并不分优劣。所以,比较制度优势不仅来源于文中所提到的两点,在更多的研究情境下,比较制度优势的来源存在哪些差异,其具体形成机制又有何不同,所产生影响的理论边界是什么,这些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

第四,比较制度优势对企业国际化进程影响作用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如前所述,比较制度优势的影响作用主要在制度改变、国家优势产业的建立等方面。为了进一步探讨比较制度优势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分析不同情境下比较制度优势与企业国际化经营绩效两者的关系是否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2)因为合理利用比较制度优势对于提高跨国企业的市场行动力与海外形象非常关键。尤其是涉及产品、品牌来源国形象方面,利用母国、东道国比较制度优势对提高跨国企业的合理性认知至关重要。为了给企业跨国经营获得制度支持创造条件,未来研究有必要探讨企业应该如何利用比较制度优势这一问题;(3)到目前为止,较多的研究侧重于讨论比较制度优势给企业国际化进程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未来研究可以从探讨比较制度优势是否可对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行补充以及对已有的研究做出新的解释这个方面出发。

第五,是否可以将制度互补性的研究范围从某个国家内部延伸到跨国企业与东道主国家之间以及不同的国家之间?正如前文所述,比较制度优势理论所研究的制度领域分为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对于企业来说,带有在母国所形成的企业制度特点进入东道国,倘若这些特点可以和企业东道国所处的经营环境相融合形成制度互补性,这时对该企业在东道主国家的跨国经营绩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另外,由于跨国企业进入东道国时很有可能会面临着东道国国家层面经营制度环境的差异,而自身已在母国的制度环境下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企业制度,那么企业怎样才能使自身的制度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间可以产生互补性。为了将制度互补性的研究范围扩大,解决以上几个问题对企业顺利进行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除此之外,由于比较制度优势理论所提到的制度包括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所以今后运用比较制度优势的相关理论来研究企业国际化问题时,要明确“制度”所指代的涵义。

第六,比较优势理论和我国国内制度环境结合情况的研究明显不足。随着企业国际化经营逐渐成为企业发展扩张的一种主流方式,国内许多企业逐渐开始在国外开设子公司,另外也有许多国外的企业进入我国国内市场。目前国内关于国际化经营的研究主要是从国际贸易、产业组织、交易成本、战略资源和制度距离等角度展开的。另外,随着对企业国际化问题认识的深入,开始有学者从比较制度优势的角度来探讨东道主国家的制度环境对跨国企业的经营过程所带来的影响,但是更多的也只是对国外学者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如汪涛等(2015)仅少数学者通过实证的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验证。

最后,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都对中国市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纵观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它们在中国市场上的表现却千差万别。中国市场在成就了众多跨国公司的同时,更多的跨国公司表现平平或者铩羽而归。其中原因既有国家层面的,也有企业层面的。中国政府所创造的环境仅是外因,跨国公司自身对中国环境的把握能力才是成败的关键,只有那些把中国的制度环境当作经营前提的企业,才能创造性地构建具有竞争力的企业经营体系。那么,基于此视角研究各国政府及其企业在中国的表现,对于政府制定中国的国家全球竞争战略和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不能期望将已形成的“中国经验”或者“中国模式”百战不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学者有充分的条件研究这些问题。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在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更有针对性地对比较制度优势对企业国际化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树立对我国制度的信心,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更大的比较制度优势。

参考文献:

- [1] 陈嘉文、姚小涛(2015). 组织与制度的共同演化:组织制度理论研究的脉络剖析及问题初探. 管理评论,5.
- [2] 陈宏辉、张麟、张滔(2016). 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吗. 珞珈管理评论,1.
- [3] 罗小芳、卢现祥(2011). 制度质量:衡量与价值. 国外社会科学,2.
- [4] 汪涛、金路欣、周南(2015). 制度互补性如何影响跨国企业的海外经营绩效——基于比较制度优势理论视角. 学术论坛,3.
- [5] Chong A, Calderón C. (2000).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Poverty Measures in a Cross-section of Countries. *Economics of Governance*, 1(2).
- [6] Levchenko A A. (2004).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7] Griffith D A & Dimitrova B V. I. (2014). Business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Psychic Distance and Complementarity of Capabilities in Export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22(3).
- [8] Singh D A & Gaur A. I. (2012).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International Strategy.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2.
- [9] Hall, P. A. & Soskice (2003).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0] Hall, P. A. & Thelen K. (2009).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Socio-Economic Review*, 7(1).
- [11] Hall, P. A. & Gingerich D. W. (2009).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9(3).
- [12] Amable, B. (2003). *The Diversity of Modern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3] Amable B, Ernst E, Palombarini S. (2005). How do Financial Markets Affect Industrial Relations; an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3(2).
- [14] Crouch C & Eds W S. (199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Capitalism: Mapping 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8(4).
- [15]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6] Acemoglu D. (2002).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4).
- [17] Kaufmann D, Kraay A & Mastruzzi M. (2007). Governance Matter VII: Aggregate and Individual Governance

Indicators 1996—2007.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3(2).

- [18] Jackson G & Deeg R. (2008). Comparing Capitalisms: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9(4).
- [19] Kirca A H & Bearden W O, Roth K. (2011). Implementation of Market Orientation in the Subsidiaries of Global Companies;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Factors.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39(5).
- [20] Forstenlechner I & Mellahi K. (2011). Gaining Legitimacy Through Hiring Local Workforce at a Premium; the Case of MNEs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6(4)
- [21] Ju J & Wei S J. (2011). When is Quality of Financial System a Sourc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4(2).
- [22] Contractor F J, Lahiri S & Elango B, et al. (2014). Institutional, Cultural and Industry Related Determinants of Ownership Choices in Emerging Market FDI Acquisition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3(5).
- [23] Höpner M & Jackson G. (2006). Revisiting the Mannesmann Takeover; How Markets for Corporate Control Emerge. *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 3(3).
- [24] Olson M. (1996). Distinguished Lecture on Economics in Government; Big Bills Left on the Sidewalk; Why Some Nations are Rich, and Others Poo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0(2).
- [25] Siems M & Deakin S. (2010). Comparative Law and Fin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66(1).
- [26] Nunn N. (2007). Relationship-specificity,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2).
- [27] Milgrom P. & Roberts J. (1990). The Economics of Modern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3).
- [28] Pradelski B S R & Young H P. (2012). Learning Efficient Nash Equilibria in Distributed System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75(2).
- [29] Scott W R. (2006).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Cinema Journal*, 24(9).
- [30] Boyer R. Coherence(2005). Divers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Capitalisms—The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 Hypothesis. *Evolutionary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view*, 2(1).
- [31] Aoki Y. (2001). New Year's Message—Future of the Institution. *Marine Engineering*, 36.
- [32] Yang Z & Su C. (2014).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Business Marketing: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43(5).

Is Institution a Constraint or Resource:

The Source and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Wang Tao, Zhao Peng & Jin Luoxin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past research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often considered to be a key factor in influencing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ain how the firm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inconvenience caused by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the host country, many scholars have put forward their own views. Some scholars begin to conduct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the capitalism comparison school” regards the institutional diversification, which could establish institu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support of different economic activities, as the resource owned by the firm.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 the p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firms cannot just consider how to adapt to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 the host country, but should make reasonable use of th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different institutions to gain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of pressur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the host countries, the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terprises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environment (Forstenlechner & Mellahi, 2011; 455-461), the decision made by enterprises is often limited by a series of pressure from external

environmental.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need not only to face the different operating environment in the different host countries (such as, different resources, competitors, partners, consumer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to face the difference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such as differ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social norm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how enterprises take actions to adapt to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host environment.

In the past, scholars mainly focus on the “institution distance” to explore how to deal with their own development by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factors limited in the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stitutional distance means that there is similarity or differences between any two countries in the formal or informal institution level (Singh & Gaur, 2012:328-341). The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ome country and the host count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hoice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entry options, national differentiation strategies and performance (Griffith & Dimitrova, 2014:50-67).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increase entry costs, reduc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limit the ability to transfer core competencies or home country experience to the host country (Contractor, Lahiri & Elango, 2014:931-941). In fact, the institution distance o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ome country and the host system is viewed as a constrai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n studies how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deal with the institution distance or difference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adapting to the host country’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the above view holds that the institution is determined by exogenous political or cultural power (Contractor, Lahiri & Elango, 2014:931-941) and that firms can achieve higher performance only by adapting to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But the conclusions of “the capitalism comparison school” on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aced by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views mentioned above. The focus of research of the school is to emphasize that the institution is a strategic resource for the enterprise and that institutional diversification can be seen as a resource owned by the enterprise and institu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at supports different economic activities (Jackson & Deeg, 2008: 540-561). In other words, if enterprise is good at using this resource, it will be able to institutionalize their ability to shape different types of strategies and collaboration models.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systems will shape the capabilities of firms through several interrelated functional areas such as finance, corporate governance, labor relations, skill formation, innovation, and so on. The comparative capitalism school argues that the strategy is constrained by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thus leads to different enterprise behavior under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systems, that is,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provides firms with differentiated advantages of different business models (Jackson & Deeg, 2008; Hall & Soskice, 2003).

However, previous research on institu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has differences in background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so there is still no consensu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concept and the source of institu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influences of institu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on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 on institu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points ou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present research. This article tries to establish a unified research framework through 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the present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order to figure out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n excavates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terprise deeply.

Key words: capitalism comparison; institu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stitutional quality;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tion

■ 收稿日期: 2016-10-11

■ 作者地址: 汪涛,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 wangtao@whu.edu.cn。

赵鹏,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金珞欣,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53201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4JZD017)

■ 责任编辑: 刘金波